

元版與明初百年刊本的連續性 從版本審定說起

井上進

元明交替是自蒙古王朝到漢族王朝的變遷，就統治者的民族而言，這裡存在著極為明顯的斷絕，而此所謂的「斷絕」，其實也是明太祖自己積極宣稱的。至正廿七年開始北伐之際，他發檄文說：「驅逐胡虜，恢復中華，……復漢官之威儀。」（《明實錄》吳元年十月丙寅）

如果元明鼎革恢復了「中華」文明，令「漢官之威儀」重生的話，那麼該時期的文化史上也應出現某種斷絕，而此斷絕亦應多少會影響到版本上。對此確有一些人認為，元版與明

版之間有著很明顯的差異，因而其鑑別並不難。如清人孫從添說：「元刻不用對勘，其字腳（即字眼，在此應謂字體）黑口，一見便知。」（《藏書記要》鑒別）雖然孫氏也指出，世上有將「明初刊本作元刻本」者，因而「真贋雜亂，不可不辨」，且在上引「一見便知」下面還說：「而洪武、永樂間所刻之書，尚有古意，至於以下板，更不及矣」，可見他也認識到洪永間刊本還沒完全失去「古意」，但儘管如此，他主要想表達的意思畢竟在「元刻……一見便知」上了。

再舉近人的例子。曾在浙江圖書館長期從事善本審定工作的毛春翔說：「鑒別元刊本，比較容易，但亦易與明初刊本相混，亦須細心鑒別，……決非如孫從添說的。」這樣他雖然否定了孫從添的「一見便知」，但也認為「鑒別元刊本，比較容易」，至於明版，「好像比鑒別宋元版要容易得多，只看字體紙張，即可決定其為明版。」（《古書版本常談》一九六二）如此看來，元明版的辨別似乎還是「一見便知」的。

的確，在明版裡佔大多數的嘉靖

以後刊白口方體字本，與元代建刊黑口趙體字本完全不一樣；再如保持著宋版風格的元代浙刊本，也與明代方字本有明顯的不同，謂「一見便知」亦可。但在明初一百年裡，除了內版與一些官刊本之外，幾乎所有的民間刊本都是福建刊本，鑒別它和元版，果真是「比較容易」，或「一見便知」嗎？事實並非如此。要辨別元版和明初刊本，若無確鑿可靠的證據，僅就版刻風氣而審定的話，絕不能做出正確的判斷。即毛氏所謂「易與相

混」這一點，才是元明之際刊本最顯著的特徵。

不僅是明初刊本，已進入明代中期的成化刊本，也經常被誤認為元版。這種錯誤是司空見慣的，如成化版《宋史》過去很普遍地被認定為至正版，直到現在也非絕無。還有日本一所圖書館，曾託某位專家編定館藏古籍目錄時，將成化版《南村輟耕錄》著錄為元版。因為此本佚去了刊書序文，很可能被書賈故意抽去了——所以導致如此結果。另外，收於四部

大廣益會玉篇卷第一



圖一 大廣益會玉篇 覆元刊本 國家圖書館藏

叢刊續編的「元版」《程史》有張元濟的跋文如此說道：是書為鐵琴銅劍樓所藏，定為元刊本。……姜子佐禹語我，涵芬樓續得一本，行款相合，後有成化刊書跋，惜未影出，今付劫火矣。余亦恍惚憶有其事。是本筆法刀工，視元本卻微有別，然未敢遽決，姑識於此，以諗讀者。

不愧是菊生先生的大雅之筆，其語氣雖很委婉，但所述事實並無歪曲。不過張元濟之所以能夠很自然地運用如「未敢遽決」這樣的婉詞，又鐵琴銅劍樓瞿氏之所以將此定為元版，不外乎是因為元代到明初一百年刊本的版式未曾發生過重大的變化。

這種元明版式的連續性，當然使得元版和明初刊本的辨別極其困難。如臺北國家圖書館見藏的聊城楊氏海源閣藏本《大廣益會玉篇》有「龍集乙卯菊節／圓沙書院新槧」的長方木記，而此「乙卯」長期以來一直被定為延祐二年，可謂已成定說了。最先是海源閣的《楹書隅錄》就這樣著錄，此後或是傳增湘《藏園羣書經



期，極像同屬於泰定本系統而刻得較粗的永樂十四年與畊書堂刊本和宣德六年清江書堂刊本（均為故宮觀海堂藏），則此「乙卯」應是宣德十年。現在《國立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增訂二版，一九八六）將此著錄為「明宣德十年圓沙書院覆元泰定二年圓沙書院刊本」，就是依照阿部氏審定的。（圖二、三、四）

「乙卯」本既是明版，又是「覆元泰定二年圓沙書院刊本」，這已經是南山鐵案了。那麼「宣德十年圓沙書院刊」呢？先就「宣德十年」說，泰定版《玉篇》本是與《廣韻》（北京大學藏）一同出版的，而且後者的覆刊本也與《玉篇》同樣有「龍集乙卯菊節／圓沙書院刊行」木記。就是說，不論是元刊還是覆刊，《玉篇》與《廣韻》是一起刊行的，而阿部氏曾將此「乙卯」本《廣韻》定為洪武八年刊（〈天理圖書館藏宋金元版本考〉，一九八〇）。由此可見，這「乙卯」到底是洪武的還是宣德的，僅靠與元版之比較，還是難以斷定。但就與《廣韻》同時所刻《玉篇》的

審定而言，他不僅用元末刊本，還用明初諸本進行比較，因此得出的結論是較為可靠的。

如此說來，尚待解決的問題只有一點：「乙卯」本究竟是不是「圓沙書院刊」？關於此點，它的木記既然有「圓沙書院新葺」字樣，似乎是不容置疑的。但果真是如此嗎？

按常理，此所謂的圓沙書院應該不是在山長指導下從事教育、研究的學校，而是建陽書坊，正如上面已提及的南山書院，或者元明之際陸續出版《韻府群玉》、《通鑑綱目集覽》、《事林廣記》等不少書籍的梅溪書院。那麼這個圓沙書院的活動時期大約在何時？

見於諸目的圓沙書院刊本不算很多，而其中最早期的是延祐二年刊《周易程朱先生傳義附錄》（北京圖書館藏），此外延祐中刊行的還有《新箋決科古今源流至論》（同上等級）、《山堂考索》（靜嘉堂等藏）以及《皇鑑彙要》（《結一廬書目》三，似乎已佚），最晚的是泰定二年刊《玉篇》、《廣韻》以及《記纂淵海》

（《浙江採進遺書總目》庚集著錄天一閣傳鈔本，似乎已佚）。據此可以推定，其出版活動在延祐泰定間相當旺盛，但到元末就看不到其跡象了。這樣的書肆到了離泰定二年已一百一十年的宣德十年，又突然孤立地只將《玉篇》、《廣韻》重刊，豈不是很離奇？那麼宣德本木記的文字，是否應該如此解釋：它的刊行者只改底本的「泰定乙丑良月」一行，而未改動「圓沙書院新葺」一行，至於此本是由誰刊行的，如今已無從得知。

「乙卯」本《玉篇》、《廣韻》雖是覆泰定本，但更改了木記的紀年，而有些元末至明代前期覆元、翻元版則連紀年的文字都未改動，例如被定為「至元二十三年刊本」的靜嘉堂藏《增入諸儒議論杜氏通典詳節》。此書僅看其名就可知道，是改編《通典》而成的舉業書，而按諸目記載，北圖藏紹熙五年擇善堂刊本似是祖本，至少是現存最古本，然後到元代出現了幾種翻版，都未更改版式，即十四行二十三字小字雙行黑口左右雙邊。（圖五）

眼錄》，或是張元濟《涵芬樓燼餘書目》，直到現在的北京、上海圖書館，無不這樣審定。不僅如此，此說在日本也未受到懷疑而接受；即《圖書寮漢籍善本書目》（一九三〇）將自藏「乙卯」版《玉篇》著錄為延祐刊本，而戰後新編的目錄也仍襲其說不

改。（圖一）

但這是錯誤的。一九七五年，阿部隆一在其《中國訪書志》中指出，「乙卯」本是據有「泰定乙丑良月／圓沙書院新葺」木記的一本（日本前田氏尊經閣藏）而覆刊的，且由其刀法看，這「乙卯」與其說是洪武八

年，不如說是宣德十年。關於此點，他後來在《日本國見在宋元版本志經部》（一九八二）裡大致做了以下的解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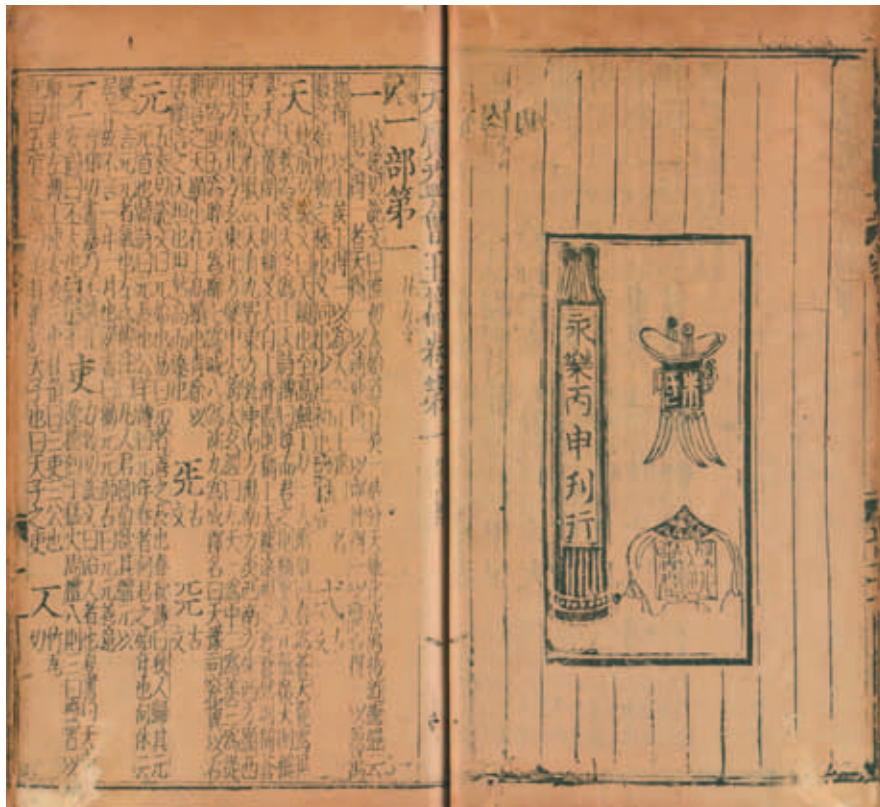
「乙卯」本確係覆泰定本，而與同樣也是覆泰定本的至正廿六年南山書院刊本相比，其版刻應在更晚時



圖四 大廣益會玉篇 明宣德六年清江書堂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二 大廣益會玉篇 元至正二十六年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三 大廣益會玉篇 明永樂十四年與畊書堂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七 增入諸儒議論杜氏通典詳節 元至元二十三年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八 增入諸儒議論杜氏通典詳節 元至元二十三年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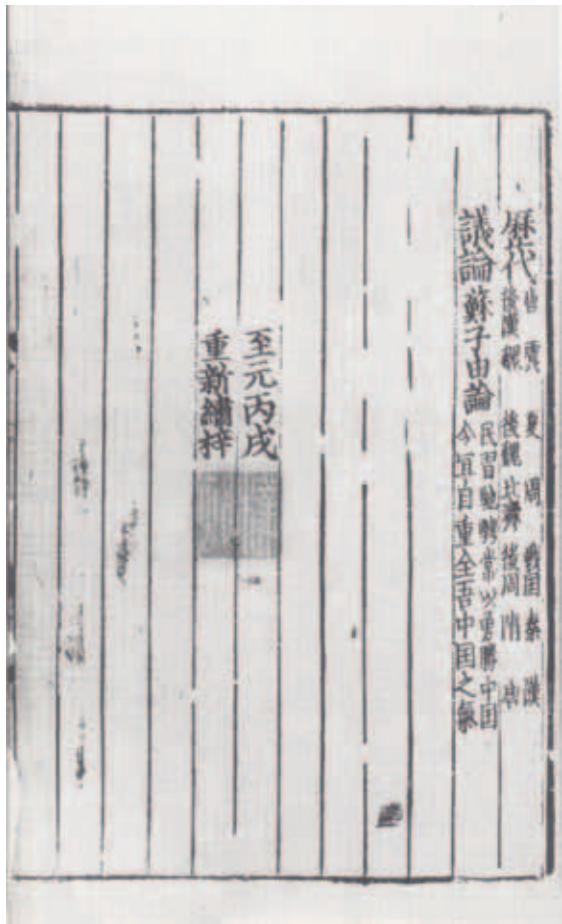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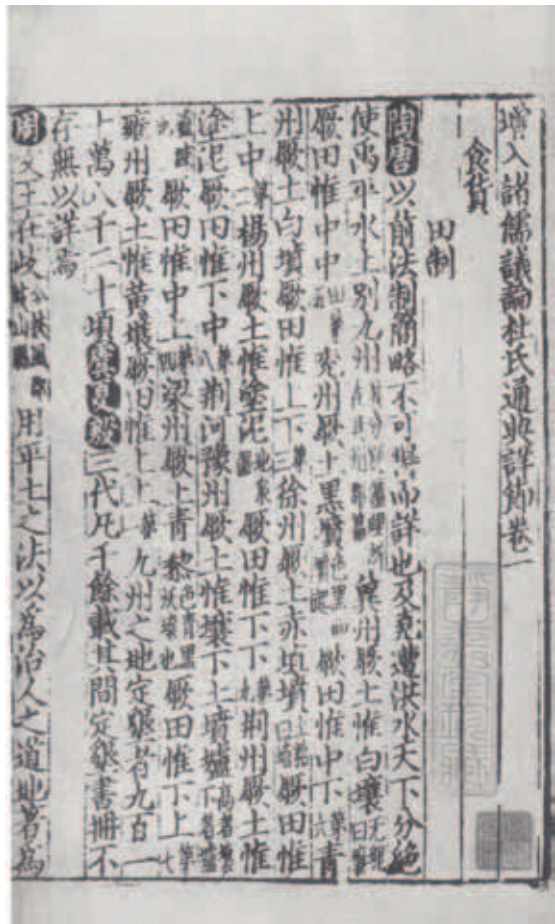
等特徵均與靜嘉堂本一致，則此兩者之為同版應該不容置疑了。（圖七、八）

另一部是清廷藏本，《天祿琳瑯書目後編》將它著錄為宋刊「麻沙

小字本」，且其書名頭二字也作「新入」，而有木記的綱目等卷首部分已佚，這大概是為了作偽，在入藏清廷以前就被故意抽去的。此本卷頭框郭和界線都有補繪，因而無法進行嚴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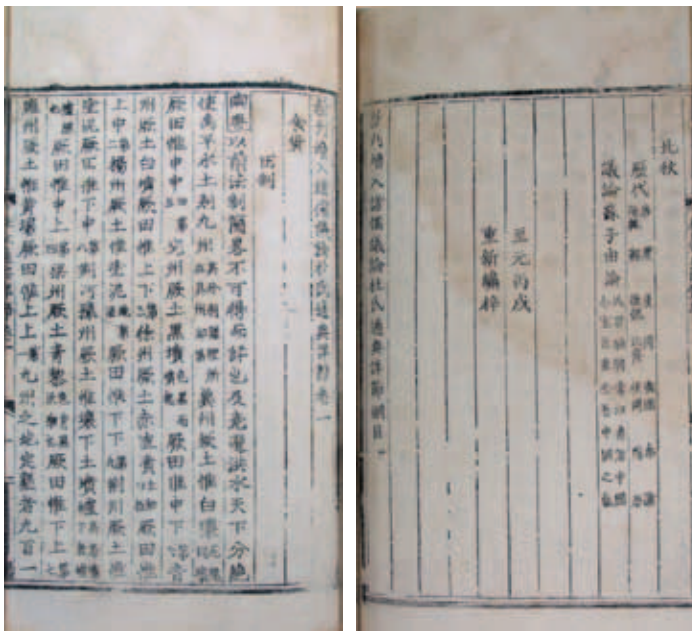
的比較，但其書名還是「增入」，版刻也大致與北平本或者靜嘉堂本一致，所以現在故宮將它定為與北平本同版，是很有見地的。（圖九）

儘管如此，靜嘉堂本或北平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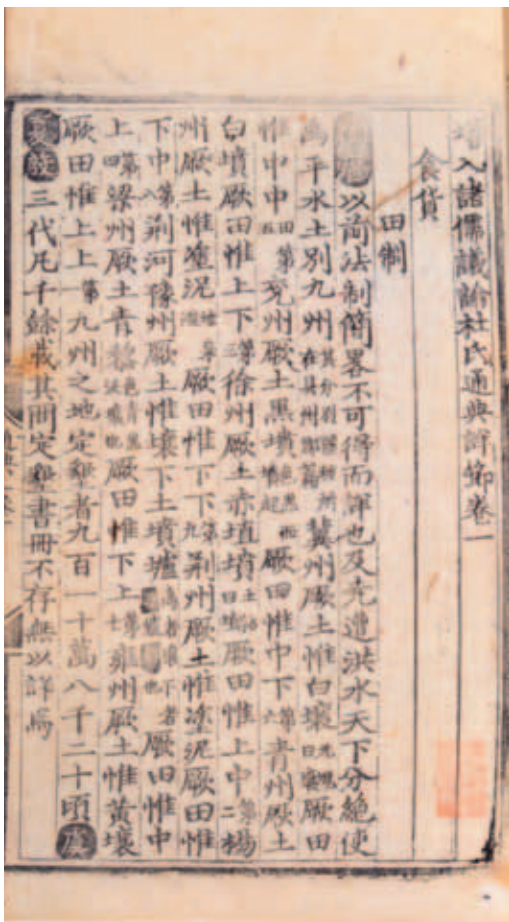
圖六 增入諸儒議論杜氏通典詳節 元至元二十三年刊本
引自日本《靜嘉堂文庫宋元版圖錄》圖五 增入諸儒議論杜氏通典詳節 元至元二十三年刊本
引自日本《靜嘉堂文庫宋元版圖錄》

靜嘉堂的所謂至元本，其版式與宋元諸本相同，但卷首諸篇為：李翰序、「杜氏通典篇第題旨」、「增入諸儒議論姓氏」、「增入諸儒議論杜氏通典詳節綱目」、「新纂杜氏通典詳節圖譜」，本文卷一至三首以及卷三、十九尾題是「增入諸儒議論杜氏通典詳節」，與宋元諸本的書名「新入」不合。除上述以外的各卷首尾固然都題為「新入」，又在綱目末也有「至元丙戌／重新繡梓」木記，但此木記的上邊二字比下邊二字小，整個結構頗不自然，其為原木記與否很值得懷疑。加之，其版刻基本上是元末建本風格，很難視為十三世紀的元初刊本，而且有些卷或葉的字樣頗為呆板，與其說是元版，不如說是明初版。如此看來，靜嘉堂本絕不會是至元原刊，而只能定為元末明初翻刊本。（圖六）

被稱為至元版的《通典詳節》，至今間有傳本，故宮也藏有三部，而此三部似乎俱是與靜嘉堂本同版。據書影而說，其中的二部北平圖書館藏本卷頭與木記，連框郭和界線的斷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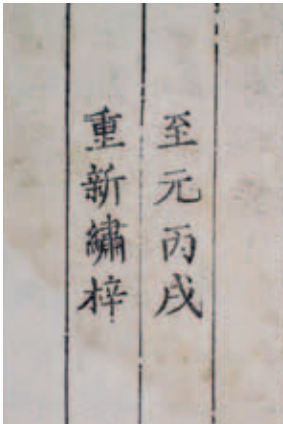
圖十 新刊增入諸儒議論杜氏通典詳節 日本國立公文書館



圖十一 增入諸儒議論杜氏通典詳節 國家圖書館藏

本《分類補註李太白詩》的幾種翻刻本來說明。

首先要提到的是日本蓬左文庫



清廷本，還是應為元末明初刊本。至於日本國立公文書館藏《新刊增入諸儒議論杜氏通典詳節》，雖然館目定為至元版，但其書名與宋元舊版相異，版式亦不同，為十一行二十三字小字雙行黑口四周雙邊，版框高二·二，寬一四·八公分，比靜嘉堂本的高一八·三，寬一二·四公分大一點。再說字樣，無論是李序的粗黑肥字，還是本文稍為古拙的軟體瘦字，都與元版全異，其刊行年代至早也應在明初一百年間的後半期，至晚

到成弘間，亦未可知。但確係明版的這一本，在其綱目末仍有「至元丙戌／重新繡梓」雙行，還保留著原本記的文字。（圖十）

再看有「弘治乙卯（八年）春，雒人喬緒督刊」跋文的《增入諸儒議論杜氏通典詳節》，應是據印工甚後、漫漶已多的明初刊本翻刊的。因此如國家圖書館藏本，其印工雖不甚後，但字樣拙劣不整，墨釘也很多。還有，弘治版是翻明初刊本的推定，也是因其書名「增入」的文字只



圖九 增入諸儒議論杜氏通典詳節 元至元二十三年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見於自卷一至三首以及卷三尾，此外大都是「新入」，即與靜嘉堂本基本相同而導出的。只是此本書名並不全與靜嘉堂本一致，卷二十七首為「新編」，卷十四首無「詳節」二字，且其版式為十二行二十四字小字雙行黑口四周雙邊，版框高二·四，寬一四公分，與靜嘉堂本、公文書館本均不相同。（圖十一）

總之，此本已與元版離得甚遠，面目全非，但在其綱目末仍有「至元丙戌（空一格）重新繡梓」一行，因此舊藏者沈德壽鈐了「藥齋珍玩／宋元秘本」印，且將此帙在其《抱經樓藏書志》裡著錄為「元刊本」。附帶一提，原為雙行的木記在此被改為一行，是因為綱目末行與尾題之間偏巧只剩一行的緣故，而在如此情形下還要保留祖本木記，可以說是頗為有趣的現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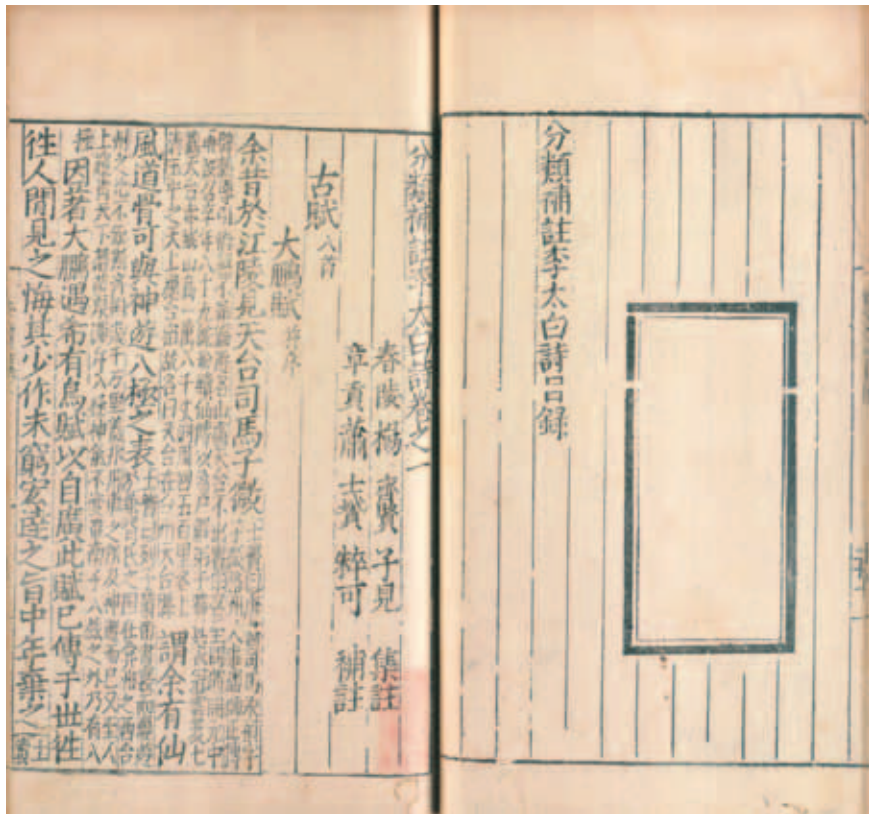
明代前期出版界未能建立自己的新風格，只能單純地模仿元版，且使其版刻水平下降，也就是說，沒有新的發展，顯出停滯，甚至倒退。這一點也能用至大三年建安余氏勤有堂刊

此。（圖十二）

號稱勤有堂本的明版，還有大倉集古館藏本。此帙題簽上由藏家寫了「元版元印李太白全集」字樣，另外，只有四周雙邊，郭內已成空白的木記裡也記有「此內考初印本，有建安余氏勤有堂刊入篆字，為後鏡去者，庚申夏至日記（鈐有「馬／卿」印）」這樣不高明的文字。此版字樣往往很拙劣，完全不像翻元版，不如說是明初覆元版的翻版更準確。再就版式而言，元版和上述覆元版俱為黑口四周雙邊，此則白口四周單邊，



圖十三 分類補註李太白詩 明初覆元至大三年余氏勤有堂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四 分類補註李太白詩 明初覆元至大三年余氏勤有堂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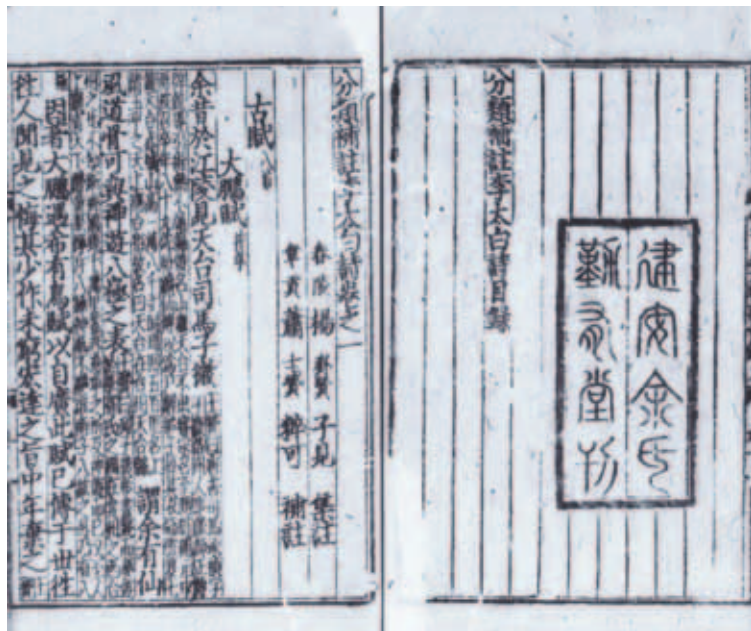
竟有兩家的目錄，真的將它著錄為元版。

元版與明初刊本是沒有斷絕而接連的，且其連續性在明初百餘年裡一直都沒有消失。如上所述，將「胡虜」的版式「驅逐」掉，樹立明代自

己的「威儀」，不用說是成化中，到了正德年間也未能完全實現。若從學術、思想觀察元明之際，元朝欽點程朱為國家正統思想，而明朝不僅沿襲，還為強化、貫徹之。於是在明初一百年裡，「國無異論，士無異習」

的太平氣象覆蓋天下，而學問和出版都陷入了極度貧乏。如此說來，明代前期出版界未敢產生異論、異習，許久未能樹立自己的風格，也是理所當然的。

作者為日本名白屋大學教授



圖十二 分類補註李太白詩 日本蓬左文庫藏

應是只襲用勤有堂本基本形式的明代中期翻版了。

除此之外，故宮觀海堂的兩種明版《李太白詩》，似乎各為上述蓬左本、大倉本的同版。或即與蓬左本同版的一本，因為卷首目錄以及卷一都是鈔配，所以其木記和卷頭也無法比較，但其版式和字樣大致與蓬左本

例，再如正德元年由蕭敏——據說是《分類補註》的撰者蕭士贊後代——刊行的一本（國立公文書館藏），也呈現出同樣趨向。此版正如蕭序所說「序例、目錄、詩、注文行款，俱仍舊本」，基本上沿襲至大本的形式，但同時「唯註文橫列太促，今與詩文並之，以便觀覽」了。就是說，鑑於

現的是：明代前期刊本一直受到元版的影響，難以順利形成自己的獨特風格。到了正德元年刊本，好容易才開始自覺地離開元版形式，但勤有堂本還保持著其規範性，因此對雙行注文字數的更改這種小事也要特地加以說明。再說正德十五年刊本，雖已全面更改行款，但由於其大黑口版心和頗存趙體面貌的字樣，遇到木記不全或已丟失——或許被書賈故意割去——的傳本，還是容易被誤定為元版。在日本

相同。至於另一本，其木記同樣成空白，又從版式和字樣而看，也與大倉本基本一致。當然，要確定上述推測，至少得用書影對照，只可惜現在還沒能實現。（圖十三、十四）

此外，王國維《傳書堂藏善本書志》也著錄一部明覆元版，據說其木記還保留著勤有堂本原樣，而此頁版心刻有「正統乙巳二月印」字樣。因為正統無乙巳歲，這或許是己巳（十四年）之誤，但不管如何，此本似乎與上述兩種版本不同，而是另一種。

元版以來的十二行二十字小字雙行二十六字的行款讀起來不太方便，特改注文數字與正文相同了。還有一個新現象值得注意，即其木記記有「皇明紀元正德太歲丙寅春三／月甲辰，章貢金精山北·冰厓／後人·粹齋八世從孫·一白中／子蕭敏重刊」的行書寫刻字樣，來顯示此為蕭氏自刊的新版。情形至此，則明版獨特的形式也要應運而生，遂至距蕭敏本稍晚的正德十五年安正書堂刊本，將其行款改為十一行二十三字小字雙行同，與元版相比，已經面目一新了。